

中国反日民众运动近三十年研究述评

贺俊杰¹, 聂庆艳²

(1.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2.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反日民众运动是中日民族矛盾凸显的产物,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研究范式来看大致经历了革命史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和社会史研究方式。从研究的切入点来看,主要集中在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社会参与、官民互动以及作用与影响等方面。既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研究内容深挖、研究方法创新与史料挖掘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反日民众运动;社会动员和参与;官民互动;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7)05-0444-06

近代以来,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深入,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间反日情绪不断酝酿、积淀,反日民众运动此起彼伏。作为“非战手段”,反日民众运动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民众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方式,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对近30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寄望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反日民众运动的研究状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

一、研究概况

反日民众运动是学界高度关注的课题之一,近三十年来学界围绕抗议二十一条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个案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从研究范式演化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革命史范式,80年代后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学界多采用革命史研

究范式。该范式强调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类研究对反日民众运动的正当性常予以肯定,认为它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同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对工人、学生、小生产者、小商人等社会阶层在运动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对政府及其官员在运动中的表现多持批判态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现代化研究范式影响,学者们将运动置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着力剖析运动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民众运动在抗击日本经济侵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资产阶级、商人及其组织、政府及其官员在运动中的作用予以较为客观的评价。

新世纪以来,社会史范式在反日民众运动研究中的运用日益受到重视。该范式注重从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探讨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影响,注重探讨运动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运动过程中的官民互动,日本对运动的反应与应对等,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研究结论也更趋客观。

学术研究的兴盛离不开史料的整理与发掘。30年来反日民众运动相关史料的整理与挖掘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主要成果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1919—192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刘明逵等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等。另外,英国外交部档案资料、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美国外交部档案资料的开放,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研究内容分述

近年来中外学者们围绕时代背景、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社会参与、官民互动以及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对反日民众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状况分述如下。

(一)反日民众运动时代背景研究

反日民众运动多因日本侵占中国的利益而起,研究反日民众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利于明确反日民众运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正义与和平,对此,学者们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鲜明的学术自觉。何国蕊^[1]分析了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背景和思想渊源,认为抵制日货运动不仅表现出中日民族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武力冲突,更重要的是在武力冲突背后中隐藏着的经济冲突。刘家鑫、白兵针^[2]对日本学者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长野朗在责任主体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模棱两可,是为日本的侵略粉饰。冯帆、石方杰^[3]认为1915年汉口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因为二十一条所引发的爱国情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汉口重商重利与狂暴的城市特性,新式报刊在汉的繁荣,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的余温,以及日本在汉势力扩张所造成的中日冲突。齐春风^[4]列举了民众八次反日运动,认为民众反日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固有权益的损害。日本学者内田辰之^[5]颠倒黑白,认为反日运动是中国人过激性格导致的,认为中国反日运动不断兴起,最终导致了中日战争的爆发。

(二)反日民众运动形式研究

反日民众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折射出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罗志田^[6]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各种力量通过集会、抵制日货、爱国储金运动、组织国耻会、纪念国耻日等活动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历时数月的反日运动,表达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李学智^[7]考察了“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的过程,分析了商人在运动中的敷衍或消极表现,认为商人们并未真正参与到抵制日货斗争中,揭示了天津商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李玉才^[8]分析了五四时期安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的原因及其特点,认为这场运动是在全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宏阔背景下展开的,充分体现了安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李永玲^[9]对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历程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于文浩^[10]从民间经济外交的角度,考察了中日两国商人团体之间抵制与“反抵制”运动,认为抵货运动是中日双方商人团体与政府间的一场博弈斗争。乐炳南^[11]对日本侵占山东与反日运动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整个反日运动过程中,经济绝交运动的成效最大。张华^[12]探讨了1931—1933年民众抵制日货状况,考察了社会团体在运动中的参与及抵制日货的影响与作用。秦鸿滨^[13]对抵制日货行为进行了反思,认为抵制日货实质就是普通民众对日本伤害中国人民情感和利益孰无可忍后,自发掀起的“民间经济制裁”。

有效抵御日本的侵略,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鉴于当时政府财力贫乏,藉民力为政府后盾一度成为人们的救国良策,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储金运动。贺俊杰^[14]分析了民国初期救国储金运动的兴起、发展、衰退的历程,肯定了其历史进步意义,认为这场运动体现了民众自发的爱国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对于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冯筱才^[15]在研究中充分肯定了虞洽卿作为领袖人物在救国储金运动中的作用。

(三)反日民众运动组织领导研究

反日民众运动有序发展、壮大离不开组织机构的领导与参与。各种组织机构的成立,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将个人的反日行为汇聚到特定的模式中,使得反日民众运动呈现出组织化、规范化的特点,使运动从开始时的无序逐步走向有序与规范。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日会、商会、反日救国会等组织机构。

商会在领导商民在罢市、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朱英^[16]全面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

天津商会的表现,分析了它与其他商会的差异,肯定了天津商会在领导商人罢市斗争、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何毅亭^[17]分析了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及作用。罗攀^[18]对济南惨案后广州商会领导商民参与抵制日货运动的情形进行了分析,认为商会的行为体现了其爱国热情,也有其局限性,总体来看商会的领导作用值得肯定。魏文享、张鑫^[19]认为天津各业同业公会的宣传和动员,强化了抵制日货运动在市场层面上的实施,体现了同业公会的爱国精神与国民责任。

反日会是民众运动的重要组织机构。周斌^[20]分析了反日会的党派关系、内部分歧及其在对日交涉中的作用。李洪珍^[21]考察了上海反日会的制度建设、组织活动及改组情况,他认为上海反日会起到了政府与民众运动联系的纽带作用。王倩^[22]探讨了天津反日会的成立过程、规章制度以及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肯定了天津反日会的作用。王庆海^[23]对“反帝大同盟”和“反日会”这两个组织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救国联合会也是当时重要的反日组织之一。陈首崔^[24]探讨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发展过程,分析了该组织在联络民众、援助罢工工人、组建义勇军、开展反日运动、创办反日刊物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付海晏^[25]对无锡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作了分析,揭示了反日运动中地方商民与国民救国会之间的矛盾冲突。

此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反日民众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周斌^[26]探讨了济南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在反日民众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共产党虽不是领导阶级,但在扩大党对反日运动的影响,恢复党的城市工作基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黄金凤、赵修磊^[27]认为济南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力图将反日、反国民党和发动民众三者有机结合,认为初期中共通过反日运动,唤醒民众与国民党抗衡,后期转变为争取民众,积蓄力量。

(四)反日民众运动社会动员与参与方面的研究

广泛的动员与参与是社会运动的必备要件。反日民众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与参与遍及学界、商界、工界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背景、政治倾向、利益结构等决定了其社会动员与参与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在运动中的不同角色扮演。

学生在反日民众运动起了先锋作用。郑文祥^[28]考察了五卅运动前后学生运动的变化及其开展情况,揭示了国民革命的动力根源。刘一皋^[29]通

过对学生群体行为的分析,考察了大规模学生群体行为发起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的变化特征及学生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关系变化。美国学者唐纳德·A·周丹^[30]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学生分三个亚群体:一受南京中央政府影响的;一受广州国民党地方派影响的;一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反日的总目标一致,但在对日策略上有分歧。王熠^[31]分析了1927—1937年间南京学生反日运动发展状况,指出国民政府、报界对学生反日运动的作用。

留学生也是反日民众运动的重要力量,并积极参与、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赵纯清^[32]认为留学生在抗议二十一条运动中,通过向政府通电、请愿,策划、组织国民大会,积极支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储金救国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运动的独特风景。周棉^[33]认为留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导燃”、引发、参与、影响五四运动历史进程的作用。

商民具有丰厚的社会资源和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在反日运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廷湘^[34]分析了抗议二十一条运动中民众情绪的变化,认为知识精英反对过激行为,商界倾向平稳,这决定了抗议二十一运动由迅速走向平静的发展态势。周石峰^[35]考察了济南惨案后各地商人的言论、作用及表现,探讨了商人在民族情感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考量,并对其在抵抗日货中的种种反应做了分析。虞和平^[36]考察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近代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及作用,探讨了商人在参与反日民众运动,如抗议二十一条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济南事件及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普通民众是反日运动社会参与的主体,在运动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冯筱才^[37]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探讨了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对五四运动的认知,认为五四运动在下层民众的眼里可能是一场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任吉东、毕连芳^[38]对天津反日运动参与群体进行了分类,探讨了社会各阶层对反日运动的态度与行为选择。吴志国^[39]考察了民众抵制日货运动的情形,并分析了政府、商界、学界、政党在运动中的态度。邵建国^[40]探究了日本制造济南事件所引发的中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分析各地反日运动的特点、民众的参与程度、领导力量及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五)反日民众运动中官民互动研究

官方的态度对反日民众运动的发展走向有着重

要影响。在运动的早期,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官方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这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壮大;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到运动的中后期,官方或为维护自身统治,或迫于外交压力,其态度往往发生转变,对运动采取压制措施,甚至会取缔民众运动组织机构。

冯筱才^[41]从执政府的角度考察五卅运动的形成、发展,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的运用是密切相关的;五四抵货运动中,地方官厅的态度很“微妙”,其基本着眼点是秩序与利益。韩国学者裴京汉^[42]探究了济南惨案发生前后,上海的反日运动及经济绝交运动的情况,阐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反日民众运动的反应及立场。马思宇^[43]探讨了天津反日运动过程中复杂的权力博弈和治理模式转换,分析了国民党处理民众运动的思想脉络、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齐春风^[44-45]认为反日会、政府、商人团体即党政商之间的冲突,分析其所持立场的缘由和影响;探讨了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对反日民众运动的态度,认为国民党积极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黄景伟、周石峰^[46]考察了济南惨案后国民党对民众抵制日货由支持领导到限制、禁止的态度变化过程。白华山^[47]对上海工商界、市政府、市党部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三者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及反应。潘健^[48]分析中日两国对“平潭惨案”的折冲过程,探讨了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制约下,国民政府为维护政权稳定,在外交交涉中压制民众的反日运动,这与“济南惨案”外交策略是一致的。左双文等^[49]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状况及国民政府采取的措施与对策,指出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劝勉的对策,其后对学生进行武力驱散。陈伟^[50]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应对学生请愿运动中的应对策略及得失。陈廷湘^[51]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发展过程及样态,并对影响学生运动的因素作了分析,认为国民政府内部对东北事变的处理不统一,导致了学生运动的高涨。乔兆红^[52]对商民协会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在执政前支持群众运动,而执政后则希望各方相安无事,即由运动民众转变为控制民众。美国学者柯博文^[53]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日本因素,考察了南京政府、地方领袖、“民意”力量三大群体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种种态度及表现,认为这体现出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六)反日民众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影响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国反日民众运动,对中国乃至日本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育民^[54]认为五四运动采取了理性的方式,诸如游行示威、演讲宣传、抵制日货,以及罢课、罢工、罢市等,展现了民众运动的新态势,开启了中国近代反帝运动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周石峰^[55]分析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肯定了抵制日货运动的作用,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单靠经济绝交还是远远不够的。刁成林^[56]探讨了1927—1937年间中国反日运动的状况,从中国和日本两个角度分析了反日民众运动的作用,认为反日民众运动使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下降,打击了日本经济发展,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中日外交交涉提供了后盾。梁华^[57]考察了1927民众抵制日货的贸易效应,认为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产品输入中国产生了抑制作用。

三、结 语

如前所述,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反日民众运动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对运动参与群体进行了分类,对资产阶级、商人与其组织、政府与官员在运动中的作用予以解析,肯定了民众运动在揭露日本侵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强化民族意识等方面的作用。这些探讨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一课题在内容深挖、方法创新与史料挖掘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为深入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

反日民众运动是一个个运动组成的集合群。既有研究多为个案研究,对运动集群现象关注不够,对运动之间的联系揭示不多,对其共同点归纳研究不足。今后要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将近代以来的反日民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时段考察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特定时空背景,深入了解反日民众运动的特点、组织机构、动员方式及其参与群体,探究反日民众运动产生及其演化的内在规律。

(二)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还不够。这导致了对反日民众运动多重面相的遮蔽。例如,对反日民众运动的组织机构的研究,对运动社会动员策略与方式方面的研究,对运动中民众参与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对运动中官民互动、博弈策略方面的研究等都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在今后研究中,要

注重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民众思想意识、经济、传统文化、民众心理等因素系统分析民众运动,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

(三)注重量化分析在研究中的运用

需要强化对反日民众运动中相关文献中数据的挖掘与分析。通过宏观的、大跨度的数量分析,探寻近代以来反日民众运动的关联性,深入揭示这一历史现象深层次结构及其规律性,全面深入考察反日民众运动兴起的特定时空背景,运动生成演化的内在机理,运动所产生的多重历史影响等。

(四)多方挖掘史料,力求史料多元化

要积极扩展反日民众运动研究的资料来源,关注反日运动的具体过程和环节,以及运动参与中下层普通百姓更为真实、细致的参与动机与心理,揭示其复杂多重面相,从而使相关研究更加精确化、细致化,使研究结论更趋客观公正。另外,现有研究中资料大多局限于中文文献,外文文献资料挖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 [1] 何国蕊. 中国 20 世纪初期的抵制日货运动及其背景和思想渊源[D].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
- [2] 刘家鑫,白兵. 中国通·长野朗的“反对抵制日货论”辨析[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29(1):60-62.
- [3] 冯帆,石方杰. 1915 年汉口抵制日货运动研究[D]. 江汉论坛,2014(8):120-124.
- [4] 齐春风. 近代中国民众何以反日[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8-11(8).
- [5] 内田辰之. 中国的反日运动的背景[M]. 东京:冬至书房,2005.
- [6] 罗志田. 救国抑救民? 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革命期间的社会思潮[M]//罗志田.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7] 李学智.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J]. 近代史研究,1995(2):176-189.
- [8] 李玉才. 五四时期安徽青年学生抵制日货运动[J]. 安徽史学,2001(1):71-73.
- [9] 李永玲. 1923 年抵制日货运动考察[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7.
- [10] 于文浩. 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博弈:以 1923 年抵制日货运动为例[J]. 南京社会科学,2016(10):139-145.
- [11] 乐炳南. 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民国十六年~十八年)[M]. 台北:国史馆印行,1988.
- [12] 张华. 1931—1933 年抵制日货运动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
- [13] 秦鸿滨. 抵制日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 特区经济,2007(6):84-86.
- [14] 贺俊杰. 民国初年“救国储金运动”概论[J]. 民国研究,2009(1):174-185.
- [15] 冯筱才. 政商中国[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6] 朱英. 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49-55.
- [17] 何毅亭.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J]. 历史研究,1989(1):85-100.
- [18] 罗攀. 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广州商会:以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为例[D]. 广州:暨南大学,2010.
- [19] 魏文享,张鑫. 天津同业公会与 1923 年抵制日货中的行业动员[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3):71-78.
- [20] 周斌. 1928 至 1929 年的反日会[J]. 近代史研究,2004(2):145-185.
- [21] 李洪珍. 政府和民众之中间地带:上海反日会个案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
- [22] 王倩. 天津反日会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0.
- [23] 王庆海. 东北地区“反帝大同盟”及“反日会”初探[J]. 社会科学辑刊,1991(5):24-29.
- [24] 陈首崔. 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 [25] 付海晏. 无锡商会与 1929 年国民救国会被捣毁风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5(5):88-94.
- [26] 周斌. 中国共产党和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2006 年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82-403.
- [27] 黄金凤,赵修磊. 中国共产党与济南事件[J]. 党史教学与研究,2007(3):63-67.
- [28] 郑文祥. 论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分化[J]. 学术月刊,2000(3):69-75.
- [29] 刘一皋.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J]. 开放时代,2009(10):36-61.
- [30] 唐纳德·A·周丹.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中的中国学生[C]//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83-190.
- [31] 王熠. 南京学生反日运动研究(1927—1937)[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 [32] 赵纯清. 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论[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3(1):6-10.
- [33] 周棉. 留学生与五四爱国运动[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6(4):21-29.
- [34] 陈廷湘. 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J]. 社会科学研究,2005(4):135-141.
- [35] 周石峰. 义利之间: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M]. 北

- 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
- [36] 虞和平.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M].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5.
- [37] 冯筱才.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J]. 社会科学研究,2005(3):136-145.
- [38] 任吉东,毕连芳. 抗战前天津反日运动群体探析[J]. 城市史研究,2016(1):118-127.
- [39] 吴志国. 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研究(1905—1937)[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 [40] 邵建国. 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 [41] 冯筱才.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J]. 历史研究,2004(1):45-62.
- [42] 裴京汉.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J]. 历史研究,2001(4):106-114.
- [43] 马思宇. 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以1928—1929年天津反日运动为中心[M]//强世功. 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六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52-173.
- [44] 齐春风. 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J]. 历史研究,2010(2):81-103.
- [45] 齐春风.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J]. 历史研究,2007(5):134-155.
- [46] 黄景伟,周石峰. 国民党对“抵货运动”之态度:以“济案”为中心[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8):99-102.
- [47] 白华山. 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48] 潘健. 海盜乎? 海難乎:1928年“平潭二二八惨案”的中日折冲[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80-85.
- [49] 左双文,郭秀文,栾成.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J]. 学术研究,2006(7):98-104.
- [50] 陈伟. 尝试与困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中的应对[J]. 民国档案,2015(1):137-143.
- [51] 陈廷湘.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J]. 历史研究,2011(1):67-87.
- [52] 乔兆红. 中国商民运动论析[J]. 社会科学,2010(6):150-159.
- [53] 柯博文. 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M]. 马俊亚,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54] 李育民. “五四”与中国近代的废约反帝运动[J]. 中共党史研究,2009(6):16-25.
- [55] 周石峰.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2-37.
- [56] 刁成林. 近代中国的反日运动研究(1927—1937)[D].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
- [57] 梁华. 抵制日货运动的贸易效应探究:以1927年为例的经验分析[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6):59-68.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of Chinese People in Recent Thirty Years

HE Junjie¹, NIE Qingy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Anti-Japanese movement is the product of China-Japan national contradictions, and an important way that Chinese people resisted the invasion of Jap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Since the 1980s, in-depth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on this topic. The research patterns include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search pattern, modernization research pattern and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pattern. The focal points of research mainly includ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rganizational form,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peopl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move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es, plentifu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but there is still a roo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respect of research content deepening, research method innovation and historical data mining.

Key words: Anti-Japanese mov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ian; China-Japan relations

(责任编辑:王艳娟)